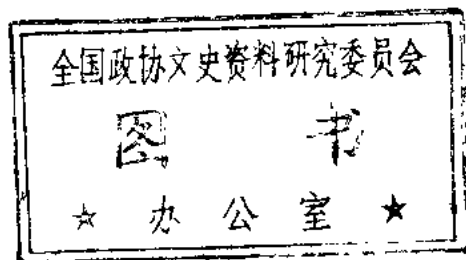


175/02

锦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锦州历史人物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锦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前 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和繁荣昌盛，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涌现了大批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们虽战斗在不同的战线，不同的岗位，但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其顽强奋斗的精神将永留史册。

在这些杰出的中国历史人物中，锦州的历史人物仅是浩瀚大海中的几束浪花，万里百花园中的几片红叶。锦州文史资料第八辑——“历史人物专辑”现已出版，它只是撷取了这几束浪花中的一束，几片红叶中的一片，用以衬托锦州大地的精华，爱国志士的足迹。

本辑共搜集在锦州地区出生或干过事业的杰出的历史人物28人，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医学专家、商人和僧人；有反帝抗日的仁人志士；有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人士，也有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反映了清末以来，锦州地区一些很有影响很有名气的历史人物的事绩。他们在政治领域或军事领域，在文化领域或教育领域，在经济领域或其它领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为祖国为家乡做出了贡献。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满腔热情，以及个人的精神风貌、高尚品格都是为后人垂范的。

本辑作者运用通俗的记述手法，为人们展示了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著名作家肖军坎坷的一生，民族实业家李善祥的终生追求，爱国民主人士田遇春所走的道路，陆善格、朱显廷、高绍辛、高国光、园通等锦州五才子发愤读书，为推动锦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的丰功史实，以及共产党员佟历生、宋国祥、钟卿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等等史料，内容翔实，文笔流畅，集历史性、故事性、趣味性于一体，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世纪以来锦州地区社会变革、人物风貌的历史画卷，很有可读性。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在有些人物的历史评价上难免出现不同之处，如有错误的地方，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目

录

著名作家萧军	(1907—1988)	宋力军 (1)
实业家李善祥	(1880—1959)	陈健翔 黄文德 (16)
爱国民主人士田遇春	(1891—1975)	田世琇 (28)
清末进士李维桢	(1873—1946)	崔景和 (34)
清末翰林陆善格	(1848—1919)	李树基 (38)
清末御史朱昱廷	(1849—1934)	李树基 (46)
锦州名士高绍辛	(1869—1931)	李树基 (52)
辽西先贤高国光	(1866—1938)	李树基 (59)
一代名僧圆通	(1842—1928)	李树基 (75)
反帝英雄王子雅	(1842—1903)	王新王 辙 (87)
民主革命先锋朱霁青	(1882—1955)	武连勤 (100)
爱国将领朱庆澜	(1874—1940)	朱德君 武连勤 (103)
抗日将领冯占海	(1899—1963)	臧瑞时 (107)
义军司令马子丹	(1894—1933)	裴景周供稿 (111)
义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锡伯骄子佟锡久	(1892—1937)	余象乾 (116)
革命英烈宋国祥	(1908—1946)	黑山党史办 (118)
忠贞战士佟历生	(1909—1941)	王广文 刘景章 (122)
人民卫士钟卿	(1919—1948)	李鸿儒王广文李文华 (125)
铁窗志士杨伯龙	(1907—1944)	吕书田 (127)
锦西好汉亮山	(1883—1934)	史炳文 (131)
飞行勇士阎海文	(1916—1937)	崔景和 (134)
开明巨商黄吉甫	(1878—1952)	朱永发 吕书田 (136)
锦州名医张继周	(1881—1942)	周世光 孙佩霖 (140)
防痨专家刘仲明	(1893—1986)	史炳文 (143)

汤玉麟生平回忆.....	商成山	徐英华(145)
冯广民二、三事.....	武连勤	吕书田(149)
刘明山闯关山抗日 (1903—1935)	崔景和	(153)
谢朝品血洒义县 (1885—1935)	商广志	吉书智(159)

著名作家萧军

宋力军



萧军，原名刘鸿霖，曾用笔名三郎、田军等。1934年10月，他在青岛给鲁迅先生写第一封信时开始使用笔名萧军，延用至今。1907年旧历5月23日，萧军诞生于辽宁省锦县大碾乡下碾盘村。

萧军的祖父刘荣，在村中颇有声望。他以弹棉花、种菜园、贩煤为生；为人沉静、自尊，做事有主见。祖母是个勤劳、慈善的乡村妇女，每天“鸡鸣入机织，日日不得息”。父亲刘青廉，是长子，兄弟姊妹9人。原以种地为生，后学得一身过硬的木工本领，成了远近闻名的细木、玻璃匠人。他热衷于开作坊、办商号，在本世纪初荒芜闭塞的辽西是一位开拓者。1931年“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后，他和弟弟们一道，参加过短期的抗日义勇军。他待人热情，性格豪爽，但脾气暴躁，夫权思想严重。母亲顾氏，是义县城东董家屯人，出身于清朝中级官宦人家。出嫁时，其祖父和父亲均已故去，家业败落。顾氏嫁到刘家为续弦。萧军出生7个月时，正值旧历腊月廿三（过小年），父亲要出远门，怨妻子只顾给孩子喂奶而没照顾他，竟把她鞭打了一顿。她不堪受辱，吞食了大量鸦片。她不愿心爱的儿子独自留在世上，也给儿子的嘴里塞了许多鸦片。幸亏萧军的五姑及时发现，才使他免于死。然而，他的母亲却没有抢救过来。父亲回来后，扶尸痛哭，追悔莫及。萧军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童年》中写道：“由五姑和四叔抱着我到每一家有乳儿的女人那里去‘赶

奶’，……。”“有时本村的奶赶不到了，就把我和五姑骑在驴背上，由四叔赶着驮到附近邻村去。为了吃一顿奶，常常要往返二、三十里的路程。”“我就是吃着众人的奶血长起来的！因此我一生也不能忘了‘众人’。”儿时的遭遇及父辈的性格对萧军幼年及以后独特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对幼年萧军影响最大，给他幼小心灵最强烈震撼，对他以后思想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则是他的家庭变化和东北大地的沦陷。

1913年，萧军6岁时，四个姑姑先后出嫁，二叔、三叔也娶了妻，父亲又给他娶了后娘。在家里，爷爷、奶奶非常溺爱他，庇护他，而父亲却信奉“棍头出孝子，恩养无义儿”的道理，对他冷若冰霜。这种鲜明的反差，使他越来越执拗、倔强，被家人称为“拧种”。这年春天，父亲把他送到本村一所私塾读书。这所私塾条件较差，先生对他管教甚严，上学成了萧军刑罚般的苦差。一天，他跑到沈家台镇找到父亲，要求退学放猪，父亲十分恼怒，一气之下扭伤了他的胳膊。1914年，父亲又把他送到沈家台镇国民小学读书。学校设在镇西北山坡的一所破旧关帝庙里，虽说是洋学堂，却施行旧礼教。教员穿长袍，入学拜孔子。虽然教他喜爱的图画、体操和他最感兴趣的历史、地理，但也有使他头痛的“四书”、“五经”，他又腻烦了，开始逃学，去山里玩耍，下河摸鱼。当然，这也难免不受父亲的毒打。

1915年，萧军8岁时，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父亲的商号破产了，债主把门市和家里所有的东西掠夺一空。爷爷和父亲带他到外躲债，过了一段艰苦的流亡生活。后来，父亲、叔叔们都到吉林当兵去了，他在家也失学了，只能到私塾外边听声，在如豆的灯光下看《西游记》。这期间他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生母的早逝，父亲的冷酷，继母的寡情，家庭的败落，似滴滴苦水灌满他的心田，滋润了他那特有的倔强性格。

萧军的童年时期，正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南方各省如火如荼的发展时期，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面临着灭

顶之灾。但在东北，封建地主阶级却变本加利地压榨农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许多生活无着落的农民被逼上了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险路。受此影响，人们希望自己的子弟到外边闯荡江湖，或是当兵，或者为匪。在他们看来，胡匪没有什么不好，兵匪一家，当官的有几个没有当过胡匪？这种近乎畸形和病态的社会风气，给幼年的萧军熏陶很深。

在下碾盘沟的10度春秋里，萧军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祖母是他走向文学道路的第一个老师。她是讲故事的好手，嗓子好，感情浓，记忆力惊人。她常在闲暇时给萧军讲《杨家将》、《薛家将》、《呼家将》之类的故事。这些故事对萧军产生了无穷的魅力，赋予他似瑰丽的文学现象。五姑会唱辽西群众喜爱的驴皮影儿，四叔会说北方风行的大鼓书。对此，萧军都如醉如痴，整天缠着他们讲唱。在这些故事的人物中，萧军敬佩的是疾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杨七郎、薛刚等，从而使他从小就崇尚豪侠，最爱习武。他在放学回来后，刻苦打拳、击剑，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幻想将来成为武林高手，背插单刀，闯荡江湖，杀贪官却污吏、打土豪、除恶霸、救弱小、铲除天下不平事。可以说，辽西粗犷的水土，猎猎的劲风，培养了萧军思想性格的特质——粗犷、豪放、豁达、刚强。也使他头脑中多了几分立体意识：“我必须要有出息，有力量，将不再屈服于任何人，有翅膀，飞向我所要飞的地方！”这就是他从文以前为什么酷爱武学，过上了一段“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苦飞”的军旅生活以及献身文学以后仍钟情于武学的原因。3位长辈讲唱的故事、驴皮影、东北大鼓中的历史人物，给了萧军纯朴的审美意识。此后，他在《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第三代》中塑造的那些铁骨铮铮，丹心耿耿的具有中华民族美德的英雄人物，都可以透视出传统文学的基因。对萧军来说，故乡下碾盘沟是他人生的第一课堂。萧军的童年完全是在辽西山野中度过的。他对自然风光，风土习俗，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对劳动和劳动人民产生了浓

厚的感情。

1917年冬天，在一个飘着大雪的清晨，萧军被家人带到锦州，坐火车去千里之外的长春投奔父亲。父亲送他到“吉长道立国民高等商埠小学”二年级插班。他的各门功课都很好，特别是国文，讲、背诵、作常列全班第一名。四年级时，他的作文《名誉说》，被班主任崔树屏老师评为“气势之雄浑、议论之纵横、字句之凝炼、不独为国四之冠，即拟于高三、亦胜一筹矣！”

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春的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示威，萧军当时只有12岁，他头戴秫秸编的“酱幕斗”，上书“提倡国货”四个大字，高呼口号，和同学们在大街上跑了几夭。此时，“国家”、“民族”的意识进一步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1922年，萧军15岁，父亲在故乡锦县下碾盘沟村给他找了个长他1岁的农村姑娘，并命他与其结婚。

1924年，萧军读到高三第一学期时，因反抗体育教员欺辱同学，被学校无理开除了学籍。辍学期间，在同学家里，萧军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他以后从事文学生涯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925年，18岁的萧军遵父命离家到外地谋生。他首先到吉林省吉林市南郊陆军三十四团骑兵营当了一名骑兵。改名刘吟飞。当时军队绝大多数士兵是文盲，而萧军读过几年书，小楷字又写得较为工整，就被提拔为“字儿兵”，在营部的书记处当上了一名“见习上士”。这样，他可以不受士兵的出操、站岗、执勤等的约束，用许多空余时间读书、写字。在同事罗炳然的鼓励与指导下，他系统地学习了唐诗、宋词，练习写作诗词。在挚友方靖远（辽宁台安县人，原山东大学副教授、现本溪市政协委员）的帮助下，他又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作品，接触了鲁迅等作家的新文学作品。在萧军的文学道路上，方靖远（方未艾）是一位引路人，两人从1925年相识保持了60几年的纯真友谊。

1927年，萧军结识了当时著名的东北诗人徐玉诺（当时吉林毓文中学教师），徐告诉萧军：“鲁迅作的《野草》是一本思想感情很深沉的书，是真正的诗！”并指导萧军阅读。继而萧军又结识了爱国者王宜之。王宜之不仅诗写得很好，而且写一手翁派（翁覃溪）大字，他曾给萧军一副对联：“居心须正大，处事要从容”。给萧军指出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启发萧军下决心冲破旧的束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正在此时，张学良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所属的宪兵教练处招生，经人介绍，化名刘羽捷的萧军竟以第八名的成绩被录取。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任“实习宪兵”。3个月的宪兵生活，使他亲身感受到社会的污浊、黑暗，他又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

1928年，萧军与方靖远一同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候补生队，学习初级军事。这年冬天，他改名刘蔚天，转入讲武堂本校第九期第十期合并的第二总队炮兵队学习。东北陆军讲武堂是一所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除了校内规定的课程外，与军事无关的任何课外书都不许看。萧军常因为看课外书受到处罚。几年的旧军旅生涯，使萧军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更加深刻。

1929年初春的一个傍晚，萧军正和同学们在田野里散步，忽听前边一群人呼喊着急叫着，踢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迎面而来，当这个东西滚到萧军脚下时，才看清原来是一颗泥血模糊的人脑袋。他不寒而慄，急忙闪开身子，快步走向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是埋葬这具尸体的地方，坟坑已扒开，萧军弯下身去，借着落日的余晖，从一个暗黄色的肩章上辨认出这个没头的死者是中国士兵。萧军茫然地眼看着这悲凉凄惨的情景，心情怅然。回到宿舍，萧军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懦》的1500字散文，署名“酡颜三郎”。5月11日沈阳一家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副刊“神皋丸杂俎”上，刊出了这篇处女作。《懦》一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就这样，萧军从创作的第一天起，就紧扣着生活的脉搏，发出了反抗黑暗势力的呼声。

1930年春天，讲武堂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学员们到市郊进行野外实习，因队长残酷殴打同学，萧军打抱不平，与队长发生了冲突，被校方无理开除了。同学们都为他没能拿到毕业文凭而深感惋惜。他自己写了一首自喻诗《开除以后》（即《言志》：“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抱韶华误清纓。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愿自一身轻。”离开讲武堂以后，他曾到辽宁省昌图县陆军第二十四旅当了几个月的准尉见习官。后来又随东北陆军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军官及武术助教。

1931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萧军认识了中共党员、沈阳平旦中学教师佟英翘。为了掩护佟开展地下工作，萧军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佟住，以军人的身份使佟免受宪警的干扰，顺利地进行着党的秘密工作。佟英翘经常介绍党内读物和进步书刊给萧军阅读，与萧军谈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这是萧军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萧军有感于国土的沦丧、民族的危亡，在吉林舒兰县与友人筹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事败，潜入哈尔滨，化名三郎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在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的影响下，从事多种形式的反满抗日活动。1932年2月由于政治环境恶劣，萧军下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他把妻子打发回锦县老家，并告诉她，自己以后要漂泊天涯，抗日救国，生死未卜，为免误青春，请她另行改嫁，从此两人断绝了夫妻关系。

1932年6月的一天，《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交给萧军一封求援信，原来是一个叫张乃莹的女文学青年写来的。她诉说了自己受骗失身被旅馆老板扣押，要被卖到白房子（下等妓院）去，希望报社申张正义，救救她。萧军看过信后，对主编说：“这女子危险，我去看看！”他急忙来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见到张乃莹。萧军听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对她深表同情。临走时，萧军忽然看到盖在高粱米饭碗的纸上写有一首小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这时，

正是吃青杏的时节，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还有几个魏碑郑体（郑文公）双钩大字。他如被电光石火击中，猛地一震，问道：“这是谁写的？”张乃莹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轻轻回答：“我写的。”萧军感到眼前这个面色苍白，异常愁苦的姑娘竟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他决心将这个多情多才的姑娘，从困厄中拯救出来。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把张乃莹救出火坑，不久，他们结为伉俪。张乃莹改名萧红。二萧相濡以沫，一起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艰苦跋涉。

萧军在哈尔滨相继结识了文学界侯小古、金剑啸（巴来）、傅洛虹（罗峰）、刘莉（白朗）、李存哲（黑人）、张少岩（金人）、杨朔、梁山丁（邓立）、唐达秋（林珏）、张文蔚、刘昨非、冯咏秋、鲁少曾、白涛、王关石、关大为、温佩筠、张洁莲、黄之明（黄田）、袁时洁等人。这些以中共党员、爱国志士为核心的进步作家，在反满抗日的共同目标下，以笔作刀枪，从各方面以各种方式展开革命文艺活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业绩。

1933年，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在《国际协报》新年增刊上发表了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她从此正式登上了文坛。这年萧军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磐石游击队领导人傅天飞。傅去哈尔滨时，曾几次到二萧的住所，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同日寇浴血奋战，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了萧军，他决心以此为题材，写一部抗日救亡小说，为抗日战争呐喊高歌。1933春天，他开始了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创作。这年10月3日，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萧军、萧红（笔名悄吟）出版了散文、小说合集《跋涉》，起到了鼓舞人民群众反满抗日的“火种”作用，不久遭到日伪当局的查禁。随着日伪反动统治的加强，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萧军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1934年6月11日，萧军化名刘毓竹与萧红秘密离开哈尔滨，

前往青岛。在青岛地下党的安排下，萧军除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外，继续创作他的《八月的乡村》一书，并开始以萧军的笔名与鲁迅通信。信中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们所写的作品的主题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的主流合拍。鲁迅先生见信的当天就回了信。后来，萧军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得到先生的覆信，就如久久生活在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河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們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力量！”在鲁迅先生的鼓舞下，萧军很快就完成了《八月的乡村》的创作。

1934年11月2日，萧军、萧红在青岛地下党安排下离开青岛，乘船到了上海。第二天在法租界拉都路北段“元生泰”杂货铺后面的二楼上，租了一间“亭子间”。定居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鲁迅先生，告诉自己到了上海，希望能早点见到先生。11月30日，鲁迅约二萧在内山书店见面，并于12月19日在梁园豫菜馆宴请了他们。在鲁迅先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萧军创作热情勃发，相继完成了《羊》、《江上》、《缘叶的故事》等小说、散文的创作。1935年，经鲁迅先生同意，二萧与叶紫组成了“奴隶社”。1935年7月，萧军自费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部表现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侵略者的伟大精神的长篇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当时进步文艺界和读者的一致赞扬，被誉为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为它写的《序》里称赞它是一部很好的书。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攻击、诋毁这部作品。鲁迅先生奋笔写了一篇杂文《三月的租界》予以反击。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坛上的一颗巨星、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了。这对萧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哀痛

欲绝，扑跪在鲁迅先生的床前，放声痛哭。作为鲁迅先生治丧办事处的成员，萧军参加了全部治丧工作，并担任了万人送葬的总指挥，在万国公墓代表《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大刊物及“鲁迅治丧办事处”致悼词；也是《鲁迅先生纪念集》编辑人员之一。此后，他经常与萧红去为鲁迅先生扫墓，常常带去新出版的、鲁迅先生生前支持的《作家》等刊物在墓前焚烧，以寄哀思。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在纷飞的炮火中，萧军紧跟时代的脚步，积极宣传抗日，并做好了鲁迅文集出版的善后工作。9月，他与萧红来到武汉，同胡风等人一起编辑《七月》。萧军在武汉的革命活动，惹恼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寻衅绑架了萧军。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同志的营救获释。

1938年3月，萧军、萧红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的邀请，来到临汾“民大”任“文艺指导”，后因日军进攻临汾，萧军看到阎锡山积极反共，遂决定辞职到五台山前线抗战。令人遗憾的是，在临汾二萧因去向问题发生了分歧，后又在西安正式解除了夫妻关系。离开临汾以后，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拜会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1938年4月底，萧军在赴新疆参加救亡文艺工作的途中来到兰州，担任了《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的编辑。在兰州，他作了多次抗日演讲，写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6月与王德芬同志结婚。因去新疆受阻，夫妻二人来到成都。经中共党员作家周文介绍，萧军接任《新民报》副刊主编。他在副刊上开辟了4个专栏并创办了一所印刷工人文艺补习学校，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团结抗战。一次，在“一二·九”纪念大会上，特务混进场内捣乱，气氛十分紧张。萧军全然无畏，只身上台，滔滔不绝地进行演讲，讲完就在群众的簇拥下

上街游行去了，特务们束手无策。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萧军任理事。他与一批作家、学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同心合力开展抗日救亡文艺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表现突出，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面对国民党的暗杀阴谋，萧军大义凛然，公开申明：我的资本一脑袋一颗，我的武器一尖刀一把；我的办法一两手换（拚个你死我活），到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出去！

1940年夏，萧军夫妇在董必武、邓颖超同志的安排下，经过千辛万苦，第二次来到延安。组织上分配他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丛书》主编，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讲师。他一边努力做好编辑工作，一边着手创作反映辽西故乡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在延安的6年，萧军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并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为他提供了许多文艺界宝贵的资料。萧军写作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有时也亲自为其审改。作为边区的参议员，萧军也为边区工作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受到边区政府的称赞。

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以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后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志曾亲笔给萧军写过10封信，和他谈过许多问题，交流过许多意见，对他十分关怀。

1945年8月，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11月，萧军夫妇随“鲁艺”迁往东北解放区办学。中途滞留张家口，与成仿吾、邓拓诸同志成立了“鲁迅学会”。1946年8月，《东北日报》刊登了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扩大招生和将由萧军任院长的消息，报名青年蜂涌而至。彭真同志亲自派人到张家口接萧军。萧军一家历经艰险于9月中旬到达齐齐哈尔，月底达到哈尔滨。萧军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应邀进行了50多天的群众演讲活动。同年

10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在哈尔滨成立，萧军被推选为常委、研究部长。11月，萧军去佳木斯就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之职。1947年春，萧军返回哈尔滨，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支持、资助下，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和主编。在萧军的领导下，出版社、《文化报》的事业有了喜人的发展，特别是《文化报》，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不久，他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置。1949年4月，萧军到抚顺矿务局总工会工作，任资料室主任兼抚矿京剧团顾问。

在抚顺期间，萧军没有消沉，没有颓丧，依然朝气蓬勃地工作。他深入各矿采写劳动英雄的事迹，撰写英雄模范的传略，并和王德芬同志一起，指导抚矿京剧团上演他创作的《武王伐纣》，轰动了整个抚顺城。这段生活，为他以后写作《五月的矿山》打下了基础。

1951年初，萧军夫妇先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市长彭真同志的关照下，先后担任北京文物组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研究员。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事《五月的矿山》、《第三代》、《吴越春秋史话》等长篇小说的创作。《五月的矿山》是当代第一部描写煤矿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以抚顺煤矿“红五月”劳动大竞赛为背景，热情地歌颂了中国煤矿工人无私无畏、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塑造了新中国煤矿工人的英雄群象。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个别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是一部当代文坛上不可多得的工业题材巨著。《第三代》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铺染辽西大地风情，塑造辽西农民形象的长卷。著作以如椽巨笔，怀着浓烈的乡情，勾划了清末民初之际辽西农村社会的政治风云，生活变迁，背景宏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且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50年代后期，萧军又克服了各方面难以想象的困难，在他的“蜗蜗居”（仅有2平方米写作间）里，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当时无望出版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他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克服巨大的精神痛苦，寻求宁静和超脱，从没

放下手中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抚养儿女，萧军一度不得不去参加正骨和针灸学习班，弃文学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九州，到处掀起动乱的狂潮。运动刚开始，萧军就受到了残酷的迫害。8月23日下午，孔庙院内，珍贵的戏装堆成小山一样高，被付之一炬，熊熊的烈火直冲云霄。200多名全副武装的红卫兵把萧军及老舍、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文艺界名人押到这里，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周围，然后用道具当武器轮番拷打。萧军被侮为“老牌反党分子”，“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又因他“最顽固”，挨打最狠最多。短柄金瓜锤敲击在他的脊背上，震动体腔五脏六腑，整个脊背皮开肉绽，背心与烂皮污血凝结在一起，钻心般地疼痛。萧军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他愤怒极了，“士可杀而不可辱”！按他为人脾性，他肯定要以死相拚了。凭他的体力和武艺，随便夺过一件兵器，完全可以打翻几个。但萧军转念，自己死了不要紧，20多名难友会是什么结局？历史又将如何结论？想到此，他咬紧牙关，强压心中怒火，抗击着一次次非人的折磨。10年“文革”中，萧军被囚禁8年之久，夫人王德芬也无数次的被批斗，全家和亲友都被株连。长子萧鸣险些被打死，小女萧黛神经失常致死，一家人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在法西斯迫害面前，萧军胸怀坦荡的一身正气，宁折不弯，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人格和高风亮节。他在困厄中写出了不少抒情言志的诗文，不啻是新时期的正气歌。如《老枣树》：铁骨杈枒托地坚，风风雨雨一十年！秋来结子红于锦，何与闲花斗嫩妍！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萧军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于1979年11月以古稀之年重返文坛，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即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翌年，北京文联第四届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北京分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分别召开，萧军被选为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作协副主席。